

校长——教育家

余立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校 长——教 育 家

余 立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全书分为“总论”、“分论”和“专论”三编。“总论”中提出了“校长应成为教育家”的命题，并从教育家的标准及其产生的客观环境、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历史意义等方面加以概括的论述；“分论”由我国一些知名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撰写，作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专论”由现仍健在的教育家撰写，全面介绍了我国八位为社会所公认，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以及他们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可供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参考。

责任编辑 郁 峰
封面设计 徐 繁

校长——教育家

余 立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46 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608-0180-3/O.28 定价：2.60元

序

理性认识，来自社会实践，实践经验，加深理性认识。《校长——教育家》成书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认识过程。但这个过程并未完结，它将随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出现而日臻完善。

记得还是在1985年，我在主持讨论编写中国高等教育史时，有同志提出：中外教育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教育家，我国建国以来，应当写哪些教育家？当然也可以写几个，但“盖棺论定者”能有几人！这是个难题，我一直在求解。1987年，李鹏同志提出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思想，给我的直觉是，我所求解的难题，似乎有了一点眉目。出于对教育的炽热感情，我毫不犹豫地在我主编的《上海高教研究》上增辟专栏，讨论大学校长怎样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并向全国发出了征稿启事。

在征稿启事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国是有悠久办学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崇敬。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办好学校要靠‘精明能干的校长’。纵观当代世界一些有影响的大学的发展历史，也莫不与有卓越才干的校长为其教育主张的实现而投其毕生精力去实践有关。应该说，一位大学校长，不仅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组织管理的专家，还是一位精通教育理论、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李鹏同志最近指出，我们的校长应该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它既为建设好这支队伍指明了方向，又为校院长实践其办学思想和办学主张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是一个多么喜人的形势”。从这

段话里可以表明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

这个启事是1987年4月发出的，截至1988年6月，《上海高教研究》编辑部就收到几十篇来稿。来稿之踊跃，稿件之质量，异乎寻常。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大连工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内蒙古大学等校的校长，都在百忙中亲自撰稿，字里行间，看出他们的精心之作，反映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独创精神。我和编辑部的王一鸣、肖庆璋同志，每当看到这些稿件，特别是对于我所熟识的同志和学校，见稿如见人，既为这些同志对这件大事的认真严肃态度以及对我们刊物的热情支持所感动，更为我国有这样一批高水平的同志和他们所领导的学校的出色成就所鼓舞。

稿件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促使我和编辑部的同志思考一个问题：怎样迅速介绍这些教育思想，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由此想到变分散发稿为集中出书。既然要出书，就要考虑它的内容体系、读者对象，而考虑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育应当作为系统工程来研究，不能象过去只研究教育的阶段性，而不研究各教育阶段的衔接性、整体性；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反映教育普遍规律的部分，各级各类教育都是适用的，不能把它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作为教育家是有客观标准的，只要符合教育家的标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乃至教师都可能成为教育家。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感到现有材料中还缺少教育的好几个方面，但受到出书时间的限制，我们只约请了几位知名的中小学校长，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而全国许多知名的中小学校长以及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的同志都未能被约请写稿。这是我们囿于高等教育，认识落后于形势所致，殊以为憾。

根据已有材料，《校长——教育家》由三编组成：第一编为总

论，主要论述历史背景、教育家标准、教育家条件、教育家成长的环境及政策调整，比较全面、系统地对这个命题作了初步的概括。第二编为分论，由全国知名的大、中、小学校长撰写。每位校长都联系当前教育改革的实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各具个性，富有特色，观点鲜明，引人深思，对于发展教育理论，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积极作用。第三编为专论，由教育家写教育家，如蔡尚思教授写蔡元培，潘懋元教授写王亚南，缪进鸿教授写竺可桢，共选了八位为社会公认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教育家，全面介绍了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习的。许多精辟的论述，独到的见解，耐人寻味，给人启迪。全书虽是以论文组成，但总论、分论、专论所论述的教育思想，是有内在联系和一定的体系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使读者得以从中既能找到教育理论，又能看到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但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主观愿望。有多少真理性，尚待实践检验。

本书是集体创作。也是近一年多来全国对这个问题研讨的结晶，这主要反映在总论和专论部分。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视野不广，还不能反映全国对这个问题研讨的全貌。在这里我们要向为本书提供材料的同志表示感谢，也要为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未能包容表示歉意。好在我们这本书只是引玉之砖，连城之璧，还在后头。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王一鸣和肖庆璋同志既做组织工作，又作文字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书，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此日心情，正是：同事得人当足矣，相期达志亦悠哉！

最后还要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使本书得以迅速出版、发行。这也说明出版社的同志对教育科学的关注。我为到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志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为教育事业的锦

绣前程而充满着信心！

余 立

1988年9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第一编 总 论

一、校长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	(8)
二、社会主义时代一定能造就大批的教育家.....	(14)
三、教育家的客观标准.....	(18)
四、社会主义教育家有其特定的要求与含义.....	(26)
五、校长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客观环境.....	(30)

第二编 分 论

树人犹是百年心.....	(43)
大学教育应是“全人教育”.....	(50)
校长要有自己的理想.....	(60)
校长要有明确的办学思想.....	(69)
校长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	(76)
要为校长成为教育家创造条件.....	(81)
我在内蒙古大学的实践.....	(92)
教育家与办学特色.....	(98)
改革与治校.....	(107)
教育家也应该是改革家.....	(118)
坚持教育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129)
高等学校要面向经济与社会发展.....	(134)
论现代工程教育.....	(141)

坚持“两个中心”是办好大学的关键	(154)
联合办学 发展高等教育	(156)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办学	(160)
培养优良的学风	(167)
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177)
教坛漫漫六十载	(197)
校长与教育工作	(210)
从上海实验学校教育实验谈校长工作	(22)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中学校长	(246)

第三编 专 论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历史经验	(265)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277)
学习徐特立关于办学规律的论述	(291)
陈望道与复旦大学	(309)
论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学校管理	(318)
王亚南的教育思想	(328)
臧仿吾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简述	(334)
从蔡元培、张伯苓看大学校长应具备的素质	(348)
勇于探索、创新的教育家——陶行知	(355)
我国需要众多现代陶行知	(381)

序

理性认识，来自社会实践，实践经验，加深理性认识。《校长——教育家》成书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认识过程。但这个过程并未完结，它将随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出现而日臻完善。

记得还是在1985年，我在主持讨论编写中国高等教育史时，有同志提出：中外教育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教育家，我国建国以来，应当写哪些教育家？当然也可以写几个，但“盖棺论定者”能有几人？这是个难题，我一直在求解。1987年，李鹏同志提出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思想，给我的直觉是，我所求解的难题，似乎有了一点眉目。出于对教育的炽热感情，我毫不犹豫地在我主编的《上海高教研究》上增辟专栏，讨论大学校长怎样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并向全国发出了征稿启事。

在征稿启事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国是有悠久办学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崇敬。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办好学校要靠‘精明能干的校长’。纵观当代世界一些有影响的大学的发展历史，也莫不与有卓越才干的校长为其教育主张的实现而投其毕生精力去实践有关。应该说，一位大学校长，不仅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组织管理的专家，还是一位精通教育理论、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李鹏同志最近指出，我们的校长应该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它既为建设好这支队伍指明了方向，又为校院长实践其办学思想和办学主张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是一个多么喜人的形势”。从这

段话里可以表明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

这个启事是1987年4月发出的，截至1988年6月，《上海高教研究》编辑部就收到几十篇来稿。来稿之踊跃，稿件之质量，异乎寻常。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大连工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内蒙古大学等校的校长，都在百忙中亲自撰稿，字里行间，看出他们的精心之作，反映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独创精神。我和编辑部的王一鸣、肖庆璋同志，每当看到这些稿件，特别是对于我所熟识的同志和学校，见稿如见人，既为这些同志对这件大事的认真严肃态度以及对我们刊物的热情支持所感动，更为我国有这样一批高水平的同志和他们所领导的学校的出色成就所鼓舞。

稿件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促使我和编辑部的同志思考一个问题：怎样迅速介绍这些教育思想，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由此想到变分散发稿为集中出书。既然要出书，就要考虑它的内容体系、读者对象，而考虑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育应当作为系统工程来研究，不能象过去只研究教育的阶段性，而不研究各教育阶段的衔接性、整体性；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反映教育普遍规律的部分，各级各类教育都是适用的，不能把它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作为教育家是有客观标准的，只要符合教育家的标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乃至教师都可能成为教育家。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感到现有材料中还缺少教育的好几个方面，但受到出书时间的限制，我们只约请了几位知名的中小学校长，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而全国许多知名的中小学校长以及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的同志都未能被约请写稿。这是我们囿于高等教育，认识落后于形势所致，殊以为憾。

根据已有材料，《校长——教育家》由三编组成：第一编为总

论，主要论述历史背景、教育家标准、教育家条件、教育家成长的环境及政策调整，比较全面、系统地对这个命题作了初步的概括。第二编为分论，由全国知名的大、中、小学校长撰写。每位校长都联系当前教育改革的实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各具个性，富有特色，观点鲜明，引人深思，对于发展教育理论，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积极作用。第三编为专论，由教育家写教育家，如蔡尚思教授写蔡元培，潘懋元教授写王亚南，缪进鸿教授写竺可桢，共选了八位为社会公认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教育家，全面介绍了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习的。许多精辟的论述，独到的见解，耐人寻味，给人启迪。全书虽是以论文组成，但总论、分论、专论所论述的教育思想，是有内在联系和一定的体系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使读者得以从中既能找到教育理论，又能看到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但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主观愿望。有多少真理性，尚待实践检验。

本书是集体创作。也是近一年多来全国对这个问题研讨的结晶，这主要反映在总论和专论部分。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视野不广，还不能反映全国对这个问题研讨的全貌。在这里我们要向为本书提供材料的同志表示感谢，也要为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未能包容表示歉意。好在我们这本书只是引玉之砖，连城之璧，还在后头。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王一鸣和肖庆璋同志既做组织工作，又作文字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书，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此日心情，正是：同事得人当足矣，相期达志亦悠哉！

最后还要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使本书得以迅速出版、发行。这也说明出版社的同志对教育科学的关注。我为到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志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为教育事业的锦

绣前程而充满着信心！

余 立

1988年9月于上海

第一编

总 论



在中外教育史上，教育家不乏其人，研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亦为研究历史所不可或缺。正如周谷城教授所说：“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出现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我们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从事过教育，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从事教育工作，也成为教育家。研究中国教育家，研究这些教育家的业绩、思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①教育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对培养造就社会主义的教育家的问题，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影响了教育家的迅速成长，使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的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1987年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贯彻党的路线和教育方针”。以后又肯定地说，我们办企业，需要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办高等学校，也需要社会主义的教育家；教育本体是学校，高等学校要有自主权，办好学校的关键是教师，校长处于中心位置，是教师的教师，校长应成为教育家，没有教育家，不可能办好社会主义学校。这是高等学校干部队伍“四化”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迫切需要。

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既要作理论探讨，更要在工作中落实，在本编中我们就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① 《中国教育家传》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一、校长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丰富实践，已经造就了一批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成绩卓著的社会主义教育家。但是，在一个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里，与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家毕竟太少。究其原因，一是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下，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思想指导下，基本上是任用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高等学校；同时，即使是那些政治、业务素养很高的老同志，也难以实施其教育主张，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更谈不上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教育家了。二是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一些同志总认为，“教育科学只是师范院校的事，综合大学、理工院校不研究教育科学，一样办学”，致使教育科学在高等学校缺乏应有的地位。三是由于教育领导体制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校长和广大教师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指示、规定、教学大纲即可，无须认真研究教育理论，使教育家的成长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四是一批原来学教育专业的同志，担任校长后也是长期忙于行政事务，原有的专业几乎丢失殆尽，他们中有的虽然也研究一些教育理论与管理科学，写过一些论文，但因得不到学术承认，在政策上将这批成果排斥于职称评定之外，使这些本来有希望成为教育家的同志，却在物质待遇和发展前途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使有志于此者寒心，也使后来者望而却步。

今天，提出校长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并不是消极的接受了历史的教训，而是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

(一) 实现高等学校的任务，需要有教育家。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又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才能培养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对校长的素质要求当然是